

# 不言与言： 早期儒墨之争的一个问题

颜世安

---

**内容提要** 《墨子》中记录了儒者公孟、吴虑对墨学最早的批评,认为墨家不应到处“言”说,墨子对此提出自己的辩护。从文献可知,早期儒家多有持“不言”风格者。公孟、吴虑的批评,代表了儒家某种共同意向。“不言”态度源于孔子本人,与早期儒家的政治学原则有关。墨子多“言”,则是因为确立了与儒家不同的政治学原则。早期儒、墨“不言”与“言”的冲突,背后是两种政治观念的冲突。孟子学兴起,以“仁爱”批评墨家“兼爱”,取代以往批评墨家多“言”,标志早期儒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

**关键词** 早期儒家 墨家 儒墨之争 不言

---

先秦诸子学中儒墨之争影响深远,学者人尽皆知。通常认为,儒墨之争起始于墨家批评儒家。<sup>①</sup>墨子草创学派的年代在战国早期,其时儒学已名声显赫,当此情形,墨学颇有必要借批评儒家以显示自家学说宗旨,各草创阶段的墨学则未必引起儒家人物注意。儒家对墨家的批评,学术界都是从孟子说起。孟子自己言及批评墨学的原因,是“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战国中期墨学影响逐渐扩大,逼使儒家不能不重视墨学。

但是孟子对墨家的批评,并非文献中所见最早的儒家批评墨家之语,《墨子》中也记录了几处儒家对墨家的批评。这些批评很简短,主要是说墨家多“言”。这个批评一向无人在意。但是从最早儒家批评墨家多“言”,墨家对此加以反驳,提出“言”的理由,到孟子对墨家提出新的批评,并一定程度转向多“言”,其间的曲折,透露了早期儒家思想演变的某种线索,值得一探。

《墨子》中有《耕柱》、《贵义》、《公孟》、《鲁问》等篇,记录墨子生平言论与活动,风格类似儒家《论语》,学界一致公认是比较可靠的记述墨子本人思想的文献。其中《公孟》篇记录早期儒墨之争资料较多,主要是墨家批评儒家之语。但是该篇的前两章,公孟向墨子提出一种观点,却记录了儒家对墨家最早的批评,先看第一章: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

公孟是儒家人物应没有什么疑问。<sup>②</sup>他认为,君子不应该主动游说王公大人,而应修身以待。“共己以待”即“恭己以待”,“恭”是一种虔敬认真的态度,就是修身。这是批评墨子游说政治上层过于主动。这一批评遭到墨子反驳,大意是说,见到统治者将有损害人民的行为,“虽不扣必鸣者也”。也就是说不必等统治者来“扣(叩)”(求教、

聘请)也要“鸣”(游说、宣讲)。从这一争论看当然是墨子更有道理。一个君子,以“义”为己任,难道眼看统治者举措不当,危害人民,也还是不闻不问,非要等统治者来请教,才发表意见吗?

但儒家何以主张“不扣则不鸣”,必有道理。因为是墨家学派的文献,公孟如何回应,没有记录。下面接着一章,公孟主张“善人”不应自我炫耀,意思与“不扣则不鸣”有相似之处: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精。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炫,人莫之取也。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

相较于前一章,公孟的观点有了一些展开的说明。在公孟的理想中,“士”应该放弃一切“行而自炫”的行为,默默坚持个人修养,只要坚持,机会自然到来,即使“处而不出”,亦会“人争求之”。当然,为什么一定只能默默坚持修德,而不能主动宣讲,这里还是没有解释。这毕竟是墨家的著作,记录儒家的观点是不会很清晰的,但至少能使我们知道儒家的态度。墨家反对的观点是清晰的,我们后面再分析,这里且辨析早期儒家的观点。

在《鲁问》篇,有一位“自比于舜”的人物与墨子有一段对话,含义与公孟墨子的对话很接近:

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吴虑为鲁人,鲁国是儒者的大本营,此外吴虑“自比于舜”,所说的不应到处宣扬“义”,与前引公孟的说法很相似,判断吴虑为一位儒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sup>③</sup>吴虑对墨子的质疑,同样语言简约,但基本意思明确,认为“义”不需“言”,只要力

行就可以。“言”可以理解为自我标榜,也可以理解为劝别人行义,政治意义的“言”就是游说。与公孟批评墨子“行而自炫……遍从人而说之”相互印证,他们的立场无疑是一样的。

公孟与吴虑对墨子的质疑,语言都很简短,只有《公孟》篇的第二章稍长一些,其他两章的质疑,都只有一句话。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话记载在墨家文献中,就像《孟子》中记载“墨者夷之”的话也很简短一样。<sup>④</sup>可是把这几处简短的质疑综合起来看,还是可以看出那时儒家对墨家的批评,似乎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墨家到处“言”,说的太多,有“自炫”的嫌疑,而且主动向统治者“鸣”,似乎也有失尊严。这一种批评,与孟子中记录的儒家学派以“仁爱”批评“兼爱”,以“爱由亲施”批评“二本”大不相同。《墨子》中记录儒家批评或质疑墨家的还有两处,一处仍是在《公孟》篇“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这表面是质疑墨家,实质却是捍卫儒家“三年丧”礼。也就是墨家批评儒家“久丧”在前,儒家回应在后,故不能视作对墨家的主动批评。<sup>⑤</sup>另一处是《耕柱》篇“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儒家主张“有斗”,质疑墨家“无斗”,这可能也是早期儒、墨之间有争议的另一个问题,但是儒、墨两家文献说到这个问题甚少<sup>⑥</sup>,可见无关宏旨,可以从略。从《墨子》中记录早期儒家少数批评墨家的言论看,值得注意的主要就是认为墨家多“言”。

早期儒家刚开始接触墨家,何以首先注意墨家多“言”?墨家重游说肯定是事实,但早期儒家人物何以注重并反感这一点,与儒家自己的风格、主张又有什么关系?这是以往思想史研究从未注意的问题。战国中期孟子批评墨家,标志墨家影响日渐加大,引起儒家认真的回应。但是孟子批评墨家已不是多“言”,而是认为“兼爱”的主张“二本”、“无父”。不仅如此,孟子自己就到处游说,是倾向多言的。孟子曾为他的“好辩”特别作出解释,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这可能就是因为儒家内部崇尚不“言”或少“言”的传统带给他某种压力,否则何必辩解?孟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他倾向于

“言”与以新的宗旨批评墨学有没有关系？这都是早期儒家思想史上隐伏未明的问题。

下面我们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以文献记载的早期儒家资料看，公孟、吴虑反对“言”而崇尚行是否代表儒家某种共同的立场？如果确是儒家早期共同立场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批评不是偶然的意见，而是涉及儒墨两家之间基本立场的分歧。第二，探讨这种分歧的思想史含义，分析儒家不“言”主张的源流，并从这一思想分歧，看孟子学的兴起。

## 二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公孟、吴虑的主张是否为前孟子时代儒家的某种共同主张。孟子之前的儒学发展情况，文献资料不多。韩非子有“儒分为八”之说：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显学》）

八家之中，子张、颜回、漆雕是孔子及门弟子，子思、乐正子是孔子隔代传人。<sup>⑦</sup>时间都比较早，但是这些人代表的学派，除子思外，我们所知甚少。

《史记·儒林传》记孔子歿后弟子活动及分化的情况：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sup>⑧</sup>

司马迁把七十子之徒分为三类，后面所举子张等人，未言属于哪一类，但子夏、子贡等人肯定是前两类，之所以特别说到子夏影响之大，则因历史学家著史书，叙人物事业，更重视参与政治活动、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司马迁并不轻视“隐而不见”的一类人，他在《游侠列传》开篇写道：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

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季次、原宪都是孔子弟子，《论语》和诸子书中多处提及原宪，提到季次较少。<sup>⑨</sup>两人都是“隐”派代表，司马迁说他们虽与当世不合，但死后四百余年仍有这一派的弟子传人追随他们的踪迹，可见其并非完全“隐而不见”，只是不愿积极入仕，怀独行君子之德，在社会上仍有相当的影响。

司马迁说孔门传人有隐者一派，对照公孟、吴虑对墨子的批评，可知这两人大体即是隐者派的人物。有人可能认为，公孟主张“不叩不鸣”，只是反对主动游说，并不是主张隐居避世。问题在于，司马迁虽用了“隐而不见”四个字，其实只是相对于“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者而言，也即这些人没有游说王侯，所以政治圈中不见他们的身影。但孔门传人中的隐者派，应当不同于扬朱、庄子以及孔子南游时遇到的长沮、桀溺。区别在于，后者对救世已经不抱希望，避世以求自保，前者却怀抱着救世的理想与热情，只是他们的方式有别于积极游说王侯的人。他们主张救世，却不肯主动游说政治人物。他们坚信只要修养德性，就一定会产生影响，如公孟所说“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精。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季次、原宪怀独行君子之德，应该也是有良玉、美女的自信。

严格说来，司马迁称为“隐而不见”的这一派人其实不应称为隐者，他们是力行修身而不愿多宣传，更不愿游说王公的怀抱救世理想的君子。公孟的话表明他们对力行修身将能产生的影响抱着大信心，把他们称为“修身”派也许更合适。对于早期儒学的“修身”派，文献中有关的记载不少，只是研究儒学史的人，未曾注意把这些资料串合起来，以考察早期儒学的传承轨迹。公孟、吴虑对墨子的批评，来自儒家以外学派的记载，并且目的是为了记录墨子的大段反驳，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原来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儒者中多有一些践行修身，不事王侯，也不愿到处宣扬的人。他们很像隐者，又不同于隐者，因为他们抱着“良玉”“美女”的自信，认为德性、学问自有力量，一

定会发生影响。这些人未必代表早期儒者的全部,但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早期儒者是有一些人走上仕途了,但还有许多人,如知名的季次、原宪,不太知名的公孟、吴虑等,在民间坚持着儒者的理想。这些人是否代表着早期儒者的某种重要倾向呢?我们现在试着汇整相关的零散的文献记录,看能否理出一个早期儒者群体“修身派”的轮廓。

《晋书·石苞传》:“(石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又《三国志·秦宓传》,“宓答书曰:‘……仆得曝背乎陇亩之中,诵颜氏之箴瓢,咏原宪之蓬户……’”魏晋时期,颜回、原宪并称,太学以颜回、原宪像并立,当是因为此二人类型接近,是孔子弟子中注重修身而不事王侯一类人的代表。原宪已如上述,司马迁把他与季次相并,为“独行君子”的师祖。颜回在《论语》中多次被提到,是孔门弟子中最得孔子赏识者。他有那样高的品行学问,却从不谈从政话题,风格很近于后来的修身派。他的安贫乐道,甚得孔子赞赏。“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在孔门的声望远超过季次、原宪,为何司马迁以后者为“隐”派(修身派)的代表,而未提颜回?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颜回去世早,殁于孔子生前。在孔子之后出现的学派分化中,季次、原宪等人有传授门徒的活动,而颜回没有,所以后世相传季次、原宪是“独行君子”的师祖。但是另一方面,因为颜回的名声大,很可能有修身派的早期儒者,虽不是颜回的传人,却愿意打颜回的旗号,所以韩非列的儒者八派中就有“颜氏之儒”。郭沫若推测庄子就是出自“颜氏之儒”一系。<sup>⑩</sup>庄子是真正的隐者,已不抱拯救世道的热望,但他的风格确与儒家修身派有相似之处。庄子是否出于颜氏之儒,还需进一步的史料证明。但这个问题对本文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战国之交,可能确有颜氏之儒,即并非出自颜回之门而打颜回旗号的一批人。这些颜氏之儒是什么人呢?肯定是与季次、原宪之徒相类的人,是与公孟、吴虑持共同主张的人。魏晋时以颜回、原宪并称,其来源应当就是早期儒家传承中,颜回、原宪虽地位不同,却影

响了同一类人。

《韩诗外传》卷三“孟尝君请学於闵子,使车往迎闵子。闵子曰‘礼有来学无往教。致师而学不能学;往教则不能化君也……’”这位战国时的闵子不知何人,孔子弟子有闵子騫,属于德行一科,行事作风与颜回接近,“德行:颜渊、闵子騫、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孟尝君欲求教的闵子与闵子騫不知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当为两种情况,第一,是闵子騫的后代,第二,是儒门中人而打“闵子”的旗号,是“闵氏之儒”的传人。当然也有可能与闵子騫无关,为一儒家人物,恰好姓闵,如此而已。“礼有来学无往教”似乎是战国儒家礼学派的一个重要原则,《礼记·曲礼上》也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个原则与公孟所说“不叩不鸣”是一个意思,但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礼学是孔门大宗,传礼的学者相信礼是经国治民的根本。《礼记·乡饮酒义》:“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这不一定是孔子本人所说,可能是礼学派的儒者假托孔子之言。“观于乡”就是观乡饮酒礼,是《仪礼》所载礼典之一。乡饮酒礼是致王道之礼,其他礼典同样如此。传礼的学者身为学问重镇,守着自信可致王道的学术,却师门相传“礼闻来学无往教”的教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儒家治学,最终目的是致王道,为何手握王道之学,又不肯主动宣教,一定要等王侯前来求学?岂不是太过傲慢。但这里的根本原因不是儒者傲慢,而是儒者对学术和政治关系有一种理解。《吕氏春秋·劝学》援引儒家观点说:“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儒者主动去教,就是丢掉了学术的尊严,一定教不进去;王侯召师来学,就是轻视老师代表的学术,也一定听不进去。儒者相信,学术引导政治,但是学术必须有尊严,才能在政治中发生力量。这是他们不肯“往教”的原因。闵子不肯“往教”是在战国中期以后,但有理由相信这是源自早期儒学的一个原则,《曲礼》可能就是较早的儒家文献。“礼闻来学无往教”的态度,与公孟、吴虑反对多“言”的态度当然是一致的。

《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

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笱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的风格在孔门也是重修德而不重从政。他在孔子死后影响很大，两戴记中记曾子的言谈活动甚多。现在简帛文献出土，子思派成研究热门。有一种说法认为子思之学传自曾子，可见曾子之学影响甚广。但曾子学的传承中，肯定有一支严格的修身派。《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有言：

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

（君子）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身言之，后人扬之；身行之，后人秉之。

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

《曾子立事》旧说为曾子所作，更大的可能是曾子后学所作，应是较早的曾子派作品。该篇主要讲修身，不特别注重“不言”。但“不言”似乎正是修身的一部分。如上述引文所言：君子日日进学修德，却不求名声，只求传之后学；君子重力行，不重言说；君子力行修德，不求迅速有名；君子向往人人行善，却不催促别人。这是何等庄严的立场、从容的气度。《礼记·中庸》篇讲“中庸之为德”与《曾子立事》甚为相似，可以相互发明。《中庸》也是比较早期的作品，至少前面讲“中庸”的十章比较早。首章讲“慎独”，似乎就是提出儒家修身的中心问题。“慎独”并非指一人独处，而是指乡居生活<sup>①</sup>，也即“隐”或“藏”的生活。《论语·述而》：“子谓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慎独”就是乡居生活中力行修身，不急不躁，严格操守。修身不是做给别人看，所以必有“不言”的气象。《中庸》和《曾子立事》都没有特别强调“不言”，但是“慎独”的乡居生活，本身就体现“不言”的气象。《中庸》说“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曾子立事》说“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

也。”两者都体现了这种不肯多言的气象。

《曾子立事》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考察：“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前引《墨子·公孟》篇，墨子在反驳吴虑的批评时，说“言”的作用有二，一是“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一是“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前者是游说王公，后者是宣教民众。不论墨家还是儒家，“言”的主要活动都是游说王公，以期影响政治。但是宣教民众也是一件重要之事，墨子提到，儒家文献也常提到。《论语》记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一个从修身到教育影响身边人群，到治理邦国的过程。教育影响身边小众人（此为“齐家”本义）是儒家修身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问题在于怎样教育影响，是“言”还是“行”？《曾子立事》说君子不要“趣”（促）人为善，便是说不必多言，盖“趣”只能通过“言”。郭店楚简《尊德义》说“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强”类似于“趣”，都是语言督促。教育民众不在语言督促，而在自身表率。“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自然就能“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重要的不是批评别人，而是严格律己。早期儒、墨之间“不言”与“言”之争，主要涉及政治游说，但也与教育民众相关，墨子对吴虑的反驳已指明这两层意思。

以上所列文献涉及原宪派、颜子派、礼学派、曾子派。早期儒学的分派情况我们所知甚少，这些派之间未必泾渭分明，彼此可能多有相互交叉。如本文所指礼学派，主要是指撰述《仪礼》、《礼记》中礼节仪文各篇的儒者归属的派别，这一派相信礼仪制度是“王道”的基础。可是颜子派、曾子派又何尝不重视礼？只是他们可能更在意修身、内省，不甚在意“笱豆”一类仪节，是以与礼学派有分别。颜子派与曾子派的分别，我们也所知甚少，只是从文献所示线索大略言之。上述诸派皆有“不言”风格，则“不言”尤其不可视为一个门户清晰的“派”，而是早期许多儒者共同推重的态度。有的派比较激烈，如季次、原宪之徒<sup>②</sup>，有的派不很激烈，如主张“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礼学派、主张“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的曾

子派，故而对多“言”的戒备，是许多儒者一致的态度。他们不仅批评墨家，对自己也有警示。《礼记·表记》说“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又说：“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把这些零散材料汇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确信，公孟、吴虑批评墨子多“言”不是偶然的说法，是代表早期儒家中许多人认同的一种态度。

### 三

早期儒家为何主张不“言”？这个问题要到《论语》中寻求答案。归根结底，早期儒家不“言”的态度源于孔子本人。

孔子主张从政。他时常寻求机会从政，同时也期待弟子学问有成，将来能参与政治。如下说法可以印证：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论语·先进》）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

但孔子虽愿从政，却坚持从政必须恪守礼乐的原则。礼乐不是简单的教条，而是深厚的古典知识和教养。孔子与弟子的对话贯穿一个意思，一个人必先“学”才能成为君子，成为君子才能领导民众。所以“政”虽是目标，“学”却是基础。一部《论语》所记孔子师生对话，谈得最多的就是“学”。“学”不仅是学习古典礼乐知识，而且是由古典礼乐知识培育一种内在生命态度。确立这样的生命态度就是有了内在德性，称为“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

孔子竟说颜回去世以后众弟子一个“好学”的也没有，这可能是针对什么特别情境说的话。但孔子确是希望弟子安心向“学”，培育深厚的学养和内在的德性，不要急于从政。这不易做到，所

以他要说弟子一个“好学”的也没有，有时又说弟子甚少“仁”德。<sup>⑬</sup>对急于从政的弟子，孔子往往严厉批评：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

孔子希望弟子能有机会从政，但是德性学问是政治的根据，如果德性学问的培植不够，急于从政，便是舍本逐末。可是德性学问的培植是长期的，也可说是终身的。何时是尽头呢？所以冉有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便是畏惧这无止境的修养过于艰难。我们知道冉求行政能力很强，他说这话的意思，便是曲折地表示自己达不到孔子要求，希望老师放过他。<sup>⑭</sup>可是孔子不许，“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由这些对话我们可以想见孔门的风气，也可以理解为何颜回、曾子深得孔子赞许。颜回、曾子以及原宪的态度，就是源自孔子本人的态度。他们传下的学派彼此见解或有不同，但都着力于培植学问根基，反对急于从政。主张“不言”便以这个态度为根据。“言”是游说、宣传，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便是觉得根本不用宣传，真正重要的是内在品质。只要有优秀人品，根本不用担心“不己知”。此外孔子个人的气质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的聪明人，“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这种性格倾向也对早期儒门风格有影响。

早期儒者不“言”的态度背后有一些颇深的内涵难以一下说清。简要地说，可以归于一种政治学的见解。在孔子看来，政治的目标是教化民众，教化者自身一定要有美德，政治才有根基。美德源于古典文化，教化者必须先“学”，领悟古典文化之美，并且进入内心。这是一个认真学习和自修的过程，不可性急。“言”其实就是着急，急于表达，急于让别人知道。一旦着急，德性修养便不扎实，政治教化的基础便不稳固。这是儒家反对“言”的主因。先秦儒家文献对于政治教化的

理解各有不同偏重,但对以下两点一致赞同:第一,君子是政治之本,君子是有内在美德的人;第二,修身是君子之本,修身是“学”和自省相结合的缓慢过程,性急不得。各派儒家对这两个原则具体表述不同,倚轻倚重之间有出入,但是大致的见解一致。《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已经确立了上述两点原则,同时也决定了儒家不“言”的基本倾向。孔子反感“巧言”,喜欢“木讷”,可能与性格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与上述政治学原则有关。孔门弟子中有原宪、颜回、曾子传下以修身为本、反对急于求仕的学派;也有在求仕上比较主动的后学,但即使是,对儒家基本政治学原则也是接受的,他们对墨家式的多“言”可能也会批评。事实上这两类人很难截然区分。修身派虽有决心“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中庸》),但如果有机会“友教士大夫”当不会拒绝;入仕派虽寻求从政,但一定会尊重沉静自修的学习过程,因为这是儒学的根基。公孟说不“言”的理由“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精。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所言很难判断是求仕的一类,还是“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一类。似乎只要是儒家,就有可能反感墨家那样的性急。

再来讨论墨家的立场。墨家为什么喜欢“言”,并在遭遇儒家批评后为“言”辩护?这是因为墨家另有不同的政治学原则,并形成不同的道义感。墨家之学原本出于儒门,也讲三代圣王,引诗书,讲忠信。但后来墨家反出儒门,确立了新的政治学原则,即墨学的“义”。<sup>⑤</sup>墨家认为政治的最大问题是要面对民生苦难,寻求解决,而且不可等待;一切怠傲、迟缓都是不义。《墨子》中批评儒家言论甚多,最主要的一条,是反对儒家礼学讲究仪典繁文,对解救民生疾苦毫无意义。学术界一致认为,墨者注重解决民生疾苦,与墨子及其徒众多是出身社会下层有关,颇有道理。墨家学派为底层贫苦民众说话,重功利,信鬼神,追求温饱,性情急切,都像是下层民众情绪的反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墨家之“义”的另一个原因,应该是与战国初年社会状况变化有关。孔子生活在春秋社会末期,其时虽然贵族社会正走向衰败,但战争之祸尚不酷烈。墨子活动大致在公元前5世纪

后期至前4世纪前期,战国初年(5世纪后期)开始的大战,这时已经对社会民众生活发生严重影响。《墨子》中多次说到战争之祸的惨烈及对人民生计的严重破坏。墨家游说诸侯的中心话题即是“非攻”。儒家批评墨家多“言”有其理由,已如上述。墨子的回应也有自己的理由,决非强辩。墨家的立场是面对民众苦难,不肯久等。儒家认为政治一定要以学问德性为根据,不能性急,可是墨家就是要急,要马上见效。墨子曾对人解释何以要“急”:

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墨子·贵义》)

墨家站在耕者的立场,觉得最底层的人生存难保,便不能不急。墨子回答公孟和吴虑的质疑,都是说“言”可以尽快见功效。儒者希望扎好根基,教化社会,但其从容不迫的做派在墨家看来却是怠惰甚至傲慢。《墨子·非儒》批评儒家有两句话非常传神“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指儒家任命,安于贫困,不在意当世急务,怠惰而高傲。我们看儒家修身派的自我描述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中庸》)、“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曾子立事》)。对照他们双方的说法,真是活画出儒家的神态。我们现在叙述早期儒、墨分歧,不作是非褒贬。儒家确实文化根基深厚,从容大度,气象辽阔;但在战国初年急剧的社会动荡中,也确实高傲迂缓,不能应对时变,注意民生苦难。检阅先秦儒家文献,不仅《论语》未曾以民生疾苦为中心问题,而其他较早的文献,如《仪礼》,两戴《礼记》中一些篇章如《曲礼》、《檀弓》、《中庸》、《曾子立事》等,还有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如《性自命出》、《六德》等,都在空前战乱背景下产生,可是没有一种文献关注民生苦难,把解救民生视为政治的中心问题。墨家批评儒家“倍(背)本弃事而安怠傲”,自有其正面的理由。早期儒、墨“不言”与“言”的冲突,各有不同的政治学立场,在这冲突背

后,可以看到早期儒学思想发展的某种重要特征。

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是孟子活动的年代。孟子的出现,标志早期儒学思想发展的一大突破,也标志儒学的某种转向。孟子是儒家中最先把注意力转向民生疾苦的人。孔子政治思想的中心是“德治”,注重教化;孟子政治思想的中心是“仁政”,注重保民。“德治”与“仁政”,是此后两千年儒家政治思想的两个主要观念,它们并非同时出现,而是由孔子和孟子先后提出。<sup>⑩</sup>“仁政”思想的提出,主要是因为孟子把注意力转向了民生苦难。这一转向的主因是战国初年社会形势的逼迫,但同时也是因为受到墨家学说的刺激。比照对读《墨子》和《孟子》,会发现两家注重民生疾苦的政治学主题十分相似,甚至有些语句都相似。孟子的时代《墨子》可能尚未编辑成书,但是散篇肯定已经广泛流行,孟子说“杨、墨之言盈天下”就是证明。孟子一定看过《墨子》的散篇,并受到思想上的冲击。孟子对墨学有严厉的批评,但与此前儒家对墨学的批评已大不一样。不是批评墨家多“言”,而是批评墨家“兼爱”。这个新的批评实际上表明,孟子与墨学有了一个一致的出发点:以对民众之“爱”为政治的根本。孟子认同了新的政治根本问题,才与墨学之间形成新一轮争论。<sup>⑪</sup>

公孟等人批评墨家多“言”,是依据孔子教化政治学的立场。教化必以修身为本,故不愿主动游说,鄙视性急。孟子批评墨家“兼爱”,是认可了对底层百姓的“爱”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在这个立场上,孟子援引并发展孔子仁学,以“性善”说论证了“爱”的根据,所以他提出的问题是,爱的根源何在?墨学虽提倡“爱”,却是功利主义的“兼爱”,没有内省的根据,被孟子斥为“二本”,实即无本。新一轮的儒墨之争,大大扩展了古代思想史的内涵。现代学者对之极为重视,这是应该的。但如果由此认为早期儒墨开始就是“仁爱”与“兼爱”之争,那就忽略了早期儒学思想演变的脉络,不仅不能理解儒家政治思想原有的立场,也不能理解孟子政治思想新立场的由来。

孟子以仁爱批评墨家兼爱,同时还伴随一个变化,就是他本人倾向“言”。孟子是一个四处游说君王的人,他并不是想做官,而是想救民于水

火。对于“解民倒悬”<sup>⑫</sup>,孟子与墨子有相似的“急”与“行无求数有成”、“立命缓贫而高洁居”的儒者大不相同。他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这是谈论“性善”时生发的感情,但同时表达了救民“溺”“饥”的急迫心情。他游说齐国不成功,离开的时候在边境等了三天,希望齐王悔悟。有人指责他:你知道齐王不怎么样,还来找他说这些大道理,这是不明智;人家不理你,你走还不快些离开,这是不爽快。孟子回答传话的人说:

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孟子·公孙丑下》)

看这段话,就觉得批评孟子的人很像是“立命缓贫而高洁居”的旧派儒者,爱惜羽毛,在乎形象。孟子则另有一种悲怜苍生的感情,因此,觉得这样的人是“小丈夫”。齐王如果愿意行仁政,“天下之民举安”,只要有一点希望他都愿意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由此转变,可以理解孟子的“好辩”。《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接着一大段话解释何以“好辩”:政治昏乱,人民苦难,杨、墨之言又“充塞仁义”。“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好辩”当然是多“言”,孟子不得不“好辩”,是因为有墨家类似的“急”。有一种观点,认为墨家开了百家争辩的先河。这是不错的,但不能因此把孟子“好辩”理解成诸子争辩时代的变化。事实上战国仍有许多儒者保持不“言”的传统,《史记·儒林传》所记的传授经典的学者、李斯建议秦王禁私学时提到的民间教学的儒生,大体如此。孟子“好辩”主要不是因为墨学引发辩论之风,而是因



为面对民生苦难,内心有“急”。

孟子仍然是儒学大宗。他开创了“仁政”的政治学原则,但并未放弃“教化”政治内涵的理念,不仅没有放弃,而且有重要的创新,开创出儒家心性学的修身传统。教化之本为君子,君子之本在修身。君子修身之学是孔子学术的核心,孟子以“性善”论、“心性”说开拓了修身之学的新境界,并成为日后宋明理学的中心思想。这一学术思想史的线索学界熟知,无需赘言。需要阐明的是,“心性”学的修身之学,与早期儒学有一脉相承之处,认为修身是缓慢的过程,不可性急。“揠苗助长”的故事就是孟子以此比喻“心”的成长绝不可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有认同墨家“急”的地方,在救民于水火;也有继承早期儒家雍容沉静的地方,在喜好古典、在内省修身。早期儒家“不言”的风格,不能应对战国初年的形势变化;但从长远看,儒学立定根基,传统文化,不计一时成败利钝,最终成为古代文化正宗,持久的功效远非求急用的墨家可比。孟子为儒学大宗,虽受墨学影响,认可解救民生苦难是政治主题,但未失儒家根本,而且对修身之学有重要创新。

“不言”与“言”是早期儒、墨之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归源于“不急”(《曾子立事》所谓“行不求数有成”)和“急”。“不急”是一种高尚的感情,觉得伟大的事业必须从容培植。“急”也是一种高尚的感情,觉得救民水火刻不容缓。二者各有源自内心的根据,它们的冲突是两种不同精神价值的冲突。孟子在早期儒学发展中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在于汇合两者。

最近十多年来,因为新出土的简帛文献陆续公布,学术界正出现一个研究“孔孟之间”儒学思想史的热潮,重点是子思学派和心性学的起源。其实这只是前孟子时代儒学发展的一个线索。新出土文献的一部分如果最终可以确定是子思派的著作,写作于孟子之前,那确实可以丰富对早期儒学的认识。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认为思孟派的思想传承是早期儒学唯一值得重视的线索,甚至不见得是主要的线索。早期儒学的思想传承是丰富而复杂的。本文引用公孟、吴虑的批评为引导,尝

试探索这一时期儒学思想传承的一个面相,可扩展我们对早期儒学思想发展及儒、墨关系的认识。

- ①墨家批评儒家的言论,《墨子·非儒》有较多记录,但是这一篇文献可能出现较晚,其中有些说法应不是墨子在世时批评儒学的论点。《公孟》篇有一段话大体可以概括墨子在世时批评儒家的几个主要论点:“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悦,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槨……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 ②孙诒让《墨子闲诂》:“惠栋云:公孟子,即公明子,孔子之徒。宋翔凤云:孟子、公明仪、公明高,曾子弟子。公孟子与墨子问难,皆儒家之言。孟与明通,公孟子即公明子,其人非仪即高,正与墨翟同时。诒让案:……此公孟子疑即子高,盖七十子之弟子也。”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71页。
- ③吴虑或疑似“无虑”,似道家。但孙诒让《墨子闲诂》注“毕云《太平御览》引作‘吴宪’。”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86页。又吴虑赞同“义”,显然与道家观念不同。应是儒门中隐者派。
- ④《孟子·滕文公上》引墨者夷之质疑孟子,孟子反驳,不记夷之回应。
- ⑤《公孟》篇还记录公孟与墨子其他争辩,大都是公孟陈述儒家观点而墨子辩驳,非公孟批评儒家墨家观点。
- ⑥《孟子·公孙丑上》有北宫黝养勇,孟施舍养勇,不知是否与儒家“有斗”有关。《荀子·正论》:“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按:宋钘为墨派,是为墨家主“不斗”的一个支派。但是“墨侠”为墨家主流,武力御暴,与“不斗”大相异趣。可知“不斗”绝非墨家主要观点。
- ⑦子思是孔子孙,他是否受过孔子直接教育,学术界有争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子思曾从学于曾子。乐正子为曾子弟子。
- ⑧“大者为师傅卿相”,《索隐》按曰:“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为齐、鲁聘吴、越,盖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齐为卿。余则未闻也。”“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之下《索隐》无按语。
- 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公皙哀字季次《索隐》曰《家语》作‘公皙克’)。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
- ⑩郭沫若《十批判书·庄子的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 ⑪《大学》解释“慎独”:“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可见“独”并非一人独处,而是“闲居”,与“见君子”(接触上层人物)相对。

⑫《史记·游侠列传》说他们“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这是与“当世”对抗的姿态,所以说比较激烈。

⑬《论语·雍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⑭《论语·先进》篇,冉求曾对孔子讲明他的政治抱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他认为自己有财政能力,但不能领导“礼乐”政治。所以他对孔子说并非不向往“道”,而是“力不足”,应该是希望孔子同意他退而求其次,只做一个能“足民”的财政官员。

⑮《淮南子·泛论训》:“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⑯学术界有人认为“仁政”思想源于孔子。如萧公权说“孔子论政,以仁为主。孟子承其教而发为‘仁心’、‘仁政’之说。其说遂愈臻详备。”《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

版,第58页。但孔子论政以仁为主并不是爱民,而是君子为政,主要还是说教化。孟子仁政有继承孔子仁学的地方,但仁爱百姓,制民之产,却是孟子首创。

⑰参见吴戈《试论孟子仁政思想与墨学的关系》,台湾《孔孟学报》第90期,2012年9月。吴戈为笔者的研究生,他以听课笔记为基础撰写此文,对孟子思想受墨学影响的问题有比较详细的梳理。

⑱《孟子·公孙丑上》:“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时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时者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作者简介:颜世安,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潘清)

## 《明史·艺文志》经部标点正误(二)

王宣标

中华书局1974年版点校本《明史·艺文志》“经部·诸经类”著录“杜质明《儒经翼》七卷。”(第2369页)此为“杜质《明儒经翼》七卷”之误。

杜氏此书,《千顷堂书目》卷三“经解类”著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整理本第84页未加书名号,故正文中不知如何标点,然据所附《千顷堂书目著者索引》:“杜质明:儒经翼。”(同上,第456页)则与点校本《明史》一样,误以为作者是“杜质明”。

按,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四九著录“杜质质《明儒经翼》七卷。未见。”下引“贡安国《略序》曰:吾友杜质氏壮年从学,五十有闻,念圣经久湮,而明儒之论有契于古者,采辑成编,皆有本之言,将以羽翼六籍,俟诸百世。辑既成,梅守德纯父氏题曰《明儒经翼》,予又为叙其编次大意云。”(《经义考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477页)可知,《明儒经翼》七卷的作者是杜质,作“杜质明”显然是错误的。

考嘉庆《太平县志》卷六《儒林》有杜氏传记,云“杜质,字惟诚,号了斋。少补诸生,从钱绪山、王龙溪游,多所指授。家甚贫,浩歌自如。邹颖泉视学东鲁,重其德望,聘主讲席。时张江陵禁道学,质闻之曰:彼禁伪耳,吾自真也。但易其名为申明乡约,讲勿辍。一以至诚相感发,满座改容。四方学者皆称杜宛陵。著有《明儒经翼》行世。

卒祀乡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62册,第127页)从中略知杜氏生平。

朱彝尊《经义考》称“未见”,则此书至清初或已稀见。今考此书除有贡安国《序》外,尚有王畿(1498~1583)《明儒经翼题辞》一篇,略云“杜子质笃志好学,久从予游,与闻师门宗要。其于六经之义,博而求之,恍然若有所契。乃集师说及同门诸君子、与夫明兴诸先辈之言有契于经旨者,哀而聚之,厘为若干卷。千圣之血脉,若有所待明也,其用心亦良苦矣。梅子纯甫题为《明儒经翼》。贡子玄略既为之序,而复执以请正于予。”(《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20页)

此书今存明刻本,这是“杜质《明儒经翼》”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群经总义类”著录“《明儒经翼》七卷。明杜质辑。明万历十六年李戴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今藏南通市图书馆、武陟县文化馆。其中,南通市图书馆藏本2009年入选第一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见江苏《省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江苏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苏政发〔2009〕28号,2009年1月14日)。第一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第148种云“《明儒经翼》七卷。(明)杜质撰。明万历十六年(1588)李戴刻本。”